

克氏全集

第二卷

麵包略取

一八九二

克

魯

海

著

著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略

取

邵可侶 (Elisée Reclus) 序 (法文本序)

彼得，克魯泡特金要我寫些字在他的書前。我便順隨了他的志願，雖然這是使我受着某種的困難。他書中所引的例證，很豐富，我不能另外增加一點什麼，現在來替他作文，恐怕是畫蛇添足，反將其中的語力減弱，有違初意，但友誼寬宥我，驅使我不得不違心的做下去了。當法國的「共和黨人」以匍伏「沙兒」(Tsar) 脚下爲無上美味的時候，我却愛與一般被「沙兒」鞭笞，終身被他幽禁於炮臺的暗監中，或縊死於冷院裏的自由人相交往。與這些朋友一塊兒，我暫時會忘却了那些在少年時代高喊着：『自由！自由！』而現在却將馬賽歌 (La marseillaise) (法國大革命期間中的歌，現爲法國國歌，反對暴君，詞句頗激烈——譯者註) 與「沙兒」頌 (Boje Tsara Khraui) 調合唱的背叛者的卑鄙。

克魯泡特金的前一本書一個革命者之言，特別注重猛烈地批評這又殘酷而又腐敗的有產階級的社會，同時欲喚起革命的毅力來反抗「國家」與資本制度。現在這本書，

是聯續前書的，語氣較平和一些。牠是向那些有善意而真願襄助社會改造的人說的，並且以很簡潔雄偉的筆法向他們述出「當前的」歷史的變象是如何能讓我們在銀行與國家的廢墟上建設人類的家庭。

我們應該在極廣義上領會本書的題目麵包略取，因為「人不但藉麵包而生活」在某一時代，寬仁厚義的勇士欲化他們社會的正義的理想生活的「現實」，他們的願望并不是祇限於略取麵包，甚至酒或鹽等，而同時須略取一切為生活所必需的，及僅有利於生活的安適的東西；更應該使我們有能力保證一切人們都需要與享樂的滿足。只要我們沒有做過這第一種的「略取」，只要世上還「有窮的人與我們一塊兒」，以「社會」二字給這種如兇獸共關一欄似的，時常相嫉而又相毀的人類的集合體，實在是太滑稽，太笑話了。

從第一章起，著者就歷舉人類已有的無限的財富，及自古公共勞動所得的不可思議的機械的工具。就現在說，每年所得的生產物很足以供一切人的麵包，若市區房屋，可

耕的田地，工廠，運輸的道路，以及學校等極大的資本，自私產一變而為公產，那末，「安樂」亦不難略取；我們可以把我們手邊的力量不用於無用的或矛盾的工作上，而使牠生產人類所需要的食品，住屋，衣服，安適，科學的研究，藝術的修養等之一切東西。

然而，人類領有物的「復原」(Reprise)總一句說，「充公」只能以無政府的共產主義去完成；應該破壞政府，撕碎牠的法律，厭棄牠的道德，不顧牠的代理人，而自己順着自己的「創制力」(Initiative)照着自己的「愛性」(Affinité)利益，理想及企圖的事業的性質，盡力去工作。這「充公」的問題，為本書中之最重要的，亦是著者以平靜的態度，明晰的眼光，很簡潔的一點沒有激烈的詞句，所記述得最詳盡畢至的——這種態度，這種眼光，是研究下次的，已成不可避免的革命的，解放了的勞工團體，在國家推翻後，不再來替一班壟斷者與寄生蟲盡徭役，就可盡力於自由工作的有趣的事業，準科學的方法，作土地的耕種，及工業的生產，間有餘暇從事於學問或行樂。本書敘述農業的幾頁給我們以很重大的益處，因為其中所敘述的事實，在實際上都已有過的，而且

很易不爲少數人致富，而爲一切人的利益而實行起來。

一般談諧的人常以「世紀的末日」(La fin du siècle)譏那些美少年的惡習與怪癖；現在不啻「一世紀的末日」了，另外還有別的呢？我們已到一個時代的末日，歷史上又一紀元了。我們看見古舊的文明全部都要湮沒，「力」的權利與「權」的貪婪，猶太粗暴的「戒訓」與羅馬險惡的法制再不能強迫我們；我們傳播一種新的信仰，自此種信仰——同時即是科學——成爲一切探求真理的人的信仰時，「實現」的世界中就有牠的位置了，因爲歷史的第一條的定則就是「社會是依牠（社會）的理想而構成的。」陳舊的秩序的保守家怎能維持這種秩序呢？他們再不信仰什麼了；他們既無領導，又無旗幟，他們只可輕率地，無目的地作戰。他們雖有法律與快槍帶棒的警察與襲擊的砲兵來反對維新者，但這一切却不能爲一種思想的敵手。任意作惡與專事壓制的一切舊制度不久都會沉沒於一種歷史前的境況中去了。

確實的，當前的革命無論牠在人類的發展中是如何的重要，而根本仍無異於先前

那些革命，完全——「突然的舉動」；自然界中所沒有的舉動。但人們可以說，無政府的社會藉幾千百不同的現象，幾千百深遠的改正，已很長久的，很充分的滋長着了。牠到處顯露出來：自由思想脫離教條的死文；探求真理者的天才不顧陳舊的法式；人類的意志顯為獨立的行動；誠實的人反抗一切強迫的紀律；彼此隨自己的願欲聯合起來，互相交換知識，而且不要「主人」，手攜着手，一塊兒去重獲他們於生活上應有的部分，及他們需要的完全的滿足，這一切就是無政府，即使牠不自知為無政府，但牠現在已漸漸地使人們認識牠了。當牠的敵衆，再無信仰了的敵衆，在那邊聽「命運」的擺佈，喊着「世紀的末日！世紀的末日！」的時候，牠怎麼不勝利呢？因牠有牠的理想和很大的胆略！

因此，這已顯露頭角的革命將會成功的。我們的朋友克魯泡特金將盡歷史家的本分，先站在革命的時期中，發表他對於由一切人的勞動而成的集合的產業應重歸公有的意見，而且喚起一般怯懦者來作有為的事業——這般人對於現世不公平的事實都很知道的，但不敢明目張胆地反抗這種有無數利益的，與「成訓」的線索繫住他們的社

會。他們知道法律是不公平的而且是虛偽的，法官是強者的侍衛，弱者的暴君，生活上合規的行爲，以勞作維持生活的誠實不妄的品格，時常得不到一塊穩定的麵包的報酬，而放小利者不顧廉恥的卑鄙，以「押」「當」爲生的借貸人的惡行，於略取麵包與安適的途中，反勝於一切的美德；但他們不依正義明顯的意義，整理他們的思想，決心企圖與行動，他們中大多數爲避免率直態度的危險，而趨入某種迂曲的狹道。例如新宗教論者，他們不能懺悔他們祖先「不合理的信仰」，甘心沉溺於某種更奇妙的神學中，無確定的教條，而失迷於混沌的感情的暗霧裏；有時爲精神論者（*Spiritiste*），或爲「玫瑰十字」黨人（*Rose-Croix*），有時爲佛教信徒，或爲顯聖跡的奇人，又如自稱是釋迦牟尼的信徒，但不費半點力量去研究教義的患憂鬱症的先生們，及終日煩悶的太太們，假裝着想於肉體的毀滅中來尋求安靜。

但是，這些美的靈魂（*Belles Ames*）既然不斷地談論理想，請她們安心罷。我們既是物質的生物，我們當然有——那是實在的——想得食物的弱點，因爲我們時常缺乏

牠；因爲現在有幾百萬我們的兄弟，斯拉夫人，「沙兒」的臣民及別的幾千百萬人都沒有牠。

然而，在麵包之外，在物質的安適之外，在田莊能給我們的一切集合的財富之外，我們看見有一種新的世界，遠遠地在我們前面顯現出來，在這新的世界中，我們彼此將能圓滿地相愛，充分地滿足理想的高尚的欲望，即一般美的溺愛者，輕視物質生活時，所謂他們靈魂的「不解之渴」的欲望！當世界上沒有貧與富之分，當餓者不以憤恨的眼睛望着飽者的時候，自然的友誼就能復生於世，而今日被遏抑的「休戚相關」(Solidarité)的「宗教」就可代替這種畫虛影的天空的虛浮的宗教了。

革命的成功將超過牠所預計的：牠將更對生命的泉源，洗淨我們與一切警察制接近的穢濁，最後將把我們從這些毒害我們生存的金錢的勾當中解脫出來。那時，每個人都能自由地走他的大道，勞工者完成適合於他的工作，探求真理者不隱匿地竭力研究，藝術家也不再爲麵包的問題而污蔑他美的理想，總之，一切的人以後都是朋友了，我們

將同心合意地實現那些詩人所瞥見的大事業呀。

這是無疑的，那時人們有時將憶起這些熱心於宣傳，一生曾以亡命與監獄爲生涯的人的名字，知道他們是預備創立新社會的人。當我們讀麵包略取時，我們立即想到他們，他們在囚柵中或在異邦收到這種共同思想的證據時，他們的精神將會舒暢而益壯。著者一定允許我將這部書呈與這些爲主義而受苦的人，尤其是呈與一個極親愛的朋友，他的一生是完全爲正義而奮鬥的。我用不着道出他的名字來，（即馬爾敦（Pierre Martin）一生坐過二十年左右的監獄——譯者註）他讀到他兄弟的這些話時，他自己能隨他的心的顫動而認識自己了。

（震天譯）

自序一（俄文本初版序）

本書是 *La Conquête du Pain* 的法文譯本，我想在這裏面，把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盡量描寫其開端的時期。

從政治與經濟上批評現社會制度，並對於代議制，法律與政權等成見，加以分析與反對，我在一個革命者之言（*Paroles d'un Révolté*）（俄文譯本的名稱為『現社會制度的崩裂或暴動者的言論』）一書裏已說過了。他的結論是應該實行充公，即一切土地，積聚的財產，必須為人類生產與生活的，而現在歸私人所有的，均須把他沒收起來。——至於本書原文則曾載於 *Le Révolté* 報社論欄，後在法國被捕入獄時，遂無機會發表這類文字了。

過三年我又出獄，仍繼續在 *Le Révolté* 報，發表這類文字。那時該報已移至巴黎，因審判廳干涉改名 *La Révolte*。

根據我們的意見解說，怎樣實行社會主義，我以為最好不描寫理想，却拿事實來證明，在社會革命時應怎樣進行，方可脫離現社會的制度，達到無政府的共產主義。怎樣是由於環境的自然前進，與我們怎樣去操縱他，即實現社會裏的傾向，或因舊社會根深蒂固，成見尚未完全拋棄，祇能仍循着奴隸的道路，不能去實行共產主義。

我以巴黎做例，是由於左列的原因：

無論任何文明的國家，決不是一個完整的，文化程度在同一的水平線。在實際牠的各部分，總站在不同的階級上。

法國雖經過一七八九年，一七九三年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十九世紀中內部的物質發展（不如英國靠向外的侵略，剝削印度與其他殖民地的利益，合收入總額的半數），與近百年中因政治怒潮而發生思想運動，但法國仍與從前一樣，是無聯絡各部的共同生活，其西北各部比東方的部分，至少落後了半世紀，農民運動的偉大革命，取消了農奴的取贖債務。二三百年前地主與教堂侵佔的土地，也被農民奪了回來。城裏工匠舉行的

暴動，想消滅城市的半奴隸制，脫離皇帝的獨裁政治。當時這類民衆運動，是限於法國的東西，正東與東南各部，至於西北與正西等處，都爲貴族與皇帝的柱石，甚至在汪台伊斯克（Vandelsk）暴動裏，拿着武器去反對雅谷賓黨的共和國。但法國的東西的區分，到現在還繼續存在。現今法蘭西共和國創造時，於選舉國會議員中，須決定共和國或帝國，共和派的選舉區域（選舉國會議員三六三名），適如我所知道的，正合一七八八與一七九二年的農民與市民的暴動地點。自從現在法蘭西共和國成立後，民主思想才傳入西北與西部的農民中去。

法國的東西部分，西南，東北，中央高原與羅那（Rhône）窪地，都如各個獨立的世界。這種分別不但在那幾州的農民中間（猶拉（Jura）的鄉村工匠與勃列東農民（Breton），其民性是兩種不相同的），就是市民裏也是一樣。祇有高賽或聖愛底安與綠昂列恩（Rennes）等處，現在還在教士權力之下，迷信着皇帝的統治！

法蘭西雖經數世紀的集權政府，實際上國家的生活，除表面的官僚聯合外，總是各

個獨立的部分。尤其是意大利與西班牙。因拉丁國家（連法國在內）是聯邦制的國家。但德國的國家派與雅各賓派，常把他們所深恨的個體獨立主義（*Particularismo*）在薩克遜谷蒂格阿加脫（*Sachsen Koenig-Owoet*）與其皇朝時發生）與各州各城的人民聯邦主義相同。

因此我深信法國的社會革命，無論他的步趨怎樣，總脫不了地方公社的性質，決不是雅各賓派的國家。任何明白本國的法國人，未為雅各賓的集權主義所迷，深知（西班牙的比伊馬爾加爾（*Pii-Margal*）也是這樣說）法國的任何革命，須是一八七一年的獨立公社，即巴黎與聖愛底安所宣布的，與巴枯寧派在馬賽里昂所嘗試的。所以法國國會會議上，決不能規定社會革命，而各城市不服從國會，恐也如一七九二與一七九三年巴黎不服從嚴刻的國會一樣。

大概各地的革命狀況，也視當地的情形與需要而異，一般宣布獨立公社的人，也將自動的解決二十世紀的社會問題。換言之，假定拉丁國家發生社會革命，則必定帶着他

方的性質。基埃里 (O. H. Luth) 說得非常確切，這是二十世紀城市革命。英國將來也免不了這樣，西班牙與荷蘭的大多數城市，也可說完全相同。我深信俄國各部由城市主動，如不將土地與一部工廠收歸公有，組織農業耕種的團體，或將產業歸社會公社經營，則恐於社會主義上毫無成功（生產工具收歸公有）。

我在 Le Revolté 報著文，是供給法國工人讀的，所以就拿巴黎做例，因這是法國文化最高的城市。我想描寫在法國與其近郊，實行社會革命時，即如一七九三年的共和國，受各守舊派的攻擊，也可以支持下去。

本書末所發生的問題，即『到底怎樣生產？』我想量力在英文本的田莊工場與手工場中說明。

（賈維譯）

自序二（英文本序）

反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最占勢力的時論之一，即是說這個思想已經是這樣舊了，然而却從不曾實現過。古希臘的思想家常常有理想國家的計畫；稍後，初期的基督教徒組織了共產的團體；又過了數百年，當宗教改革運動的時期，便有大的共產結社發生。後在英法大革命之際，這同樣的理想又復活起來；最後近世法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爆發了，這個革命受社會主義的理想尤廣。因此便有人告訴我們說：『你們試看罷，你們的計畫的實現期還遠得很呢！你們也曾想到你們對於人類的本性及其需要的了解，究竟有沒有些根本的謬誤？』

驟視之，這個反對論似乎很利害。但我們考察人類歷史時若更加精密一點，這個反對論就會失掉力量了。第一，我們看見有億萬的人在他們的村落社會中能夠維持了那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元素——生產的主要器具，土地，歸為公有，並且依據各家族的勞

動能力來分配——以至於數百年之久；我們又知道西歐土地共有制之崩壞，不是從內部，而是從外部被政府創設土地的獨占幫助貴族和中產階級所致。我們還知道中世紀的都市能夠繼續了幾百年，維持着某種社會化的生產和商業的組織；這數百年都是智識上、工業上和美術上進步最速的時期；至於此等共產制度的衰頹，大半因為當時人們沒有能力，不能聯合農村和都市，農人和市民協力來反對那個摧殘了自由都市之武力的國家的生長。

這樣來了解的人類的歷史，是並不能供給反對共產主義的論證的。反之，彼却是實現某種類的共產組織之努力的一種連續，這種努力在某時期之內是會得着部分的成功的；而且我們還敢斷言人類至今還沒有尋着依共產的原則，把農業和突然發展的工業以及發展得很快的人類的通商結合起來的適當方式。這所謂世界的通商尤其顯出一個騷動的元素，因為彼不單是那藉遠道的商業和出口而增進自身的財富之個人的或城市的了；而且國民全體，取利於那些工業不發達的國家來增加自己的財富。